

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五十周年 文史资料专辑

貴州人民抗日戰爭紀念碑

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合 编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文史资料专辑

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合编

黔新出(95)内图资准字第1——02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印制

工本费 5.00 元

目 录

概述贵州各族人民对抗战的奉献·····	尹 恪(1)
抗战时期贵阳的工人运动和国际 援华医疗队 ·····	蔡继聪(18)
抗战时期贵州高等教育迅猛发展 ·····	欧阳霖(23)
用爱国主义旋律谱写的乐章 ——抗日救亡活动片断回忆 ·····	尹克恂(28)
八年抗战时期的回忆 ·····	萧醒球(40)
万宝街的依恋 ·····	车祖尧(45)
血债难忘——回忆贵阳“二四”被炸的 前前后后 ·····	张 垠(52)
历史不会忘记 ·····	孟昭方(56)
永远不要忘记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 ·····	彭晓珍(59)
“二四”轰炸前后的中南棉布店 ·····	朱志国 朱林祥(63)
日军入侵独山的种种罪行 ·····	朱丽泉(65)
含泪忆当年 ·····	傅笑岩(68)
我所目睹的敌机狂轰滥炸罪行 ·····	周仕珍(74)
日军残暴罪行的见闻 ·····	徐允鳌(79)
童年的记忆 ·····	薛 宁(86)
一个寒冬的夜晚 ·····	陶祖弘(89)
悼念在南京抗战中死难的四弟 ·····	王光炜(9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	王得一(95)

一二一师在襄河战斗中与新四

军并肩作战	胡光中(97)
慷慨悲歌话远征	罗再启(100)
殒山之战	刘铁轮(106)
殒山人民怀念一〇二师	徐一鸣(109)
“卜福斯”得救了	习世祥(116)
抗日将领罗启疆	黄前进(119)
忆我的父亲陈蕴瑜将军	陈先懋(122)

对贵州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和贵州

伤员之友社的片断回忆	王 伦(129)
贵医师生积极支援抗日救国斗争	惠玉阶(134)
我用镊子、急救包为抗战作贡献	丁 敏(137)
参加支援滇缅公路及湘桂黔边	

抢运任务纪实	王仲南(140)
抗战时期贵州的铁路和机场的修筑	林国忠(147)
修建滇缅铁路见闻	周光明(156)
抗战时期贵州的公路建设	钟海珍(162)
记军医署第四医务督导组	杨锡寿(169)
镇远“和平村”散记	杜松竹(172)

海校育英才	杨隆昌(180)
陪同日本客人重访独山战地	沈季辉(182)

资料:抗日战争中贵州籍

部队部分阵亡官佐名录	李祖明辑(184)
编后	(217)

概述 貴州各族人民對 抗戰的奉獻

尹 恪

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尤其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残酷战争洗礼的一代人，每每想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东北以活人作细菌试验，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对大后方不设防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对沦陷区肆意蹂躏践踏，……心灵上无不受到剧烈的震撼。我们谴责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中华民族的血泪史。

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最先提出民族和解、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各族各界民众、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纷纷投进抗日的滚滚洪流中，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克服了一盘散沙

的状况,团结起来,浴血抗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自1840年以来反对外来入侵之敌的第一次的彻底的胜利,爱国主义是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团结各族人民的光辉旗帜。

贵州虽然僻处西南,是抗战的大后方,同样经受着战乱的摧残,同样燃烧起熊熊的抗日烽火。贵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支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奉献。

一、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贵州地下党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有利形势,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一)重建省工委,加强贵州党的建设和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抗日战争爆发后,贵州同全国一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9月,党中央派黄大陆由延安回到贵阳,与隐蔽在贵阳坚持工作的李策等人取得联系,清理整顿了党的组织,以省工委的名义开展活动。

为了加强党对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中央于1938年2月又派邓止戈、秦天真回贵州,与黄大陆、李策组成新的一届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任书记。(注:此时黄、李已被捕)

这一时期,在省工委领导下,党的组织有着较大发展,遵义、贵阳、安顺、毕节、织金、思南、黔西、湄潭、镇远、桐梓、晴隆等县,先后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凯里、平越建立了支部或小组。党在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生活、读新书店、公路运输单位以及大部分中学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了应付势不可挡的抗日怒潮,一方面给予一些公开组织以合法存在的权利,一方面建立了以党、

政、军、学、商、工、妇等机构主要负责人任委员的贵州各界抗敌后援会。这个机构，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俞嘉庸为秘书长、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训科长刘孔亮为组训部长，下辖商人、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僧尼、儿童等抗日救国会，并设有宣传部、募捐部、调查部等。调查部下设锄奸队，由省会贵阳警察局局长汪荣和省党部调统室主任程剑声担任正副部长。对此，国民党省党部设计委员兼肃反专员陈惕庐曾不加掩饰地说：“锄奸队的工作对象就是共产党。”因此，这个官办的抗敌组织，虽然也作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其目的并不是广泛发动群众，而是力求把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纳入其控制之下。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贵州省工委和各地区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利用多种形式，进行了秘密与合法的斗争，先后组织了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并通过贵阳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遵义青年抗敌救国会、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以及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学习小组、遍布全省的大中小学的歌咏队、话剧队，还有职工中的抗日救亡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抗日救亡的实践，培养了骨干，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组织，使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 50 多人扩大到 500 多人。

（二）学联的建立及活动

1937 年 6 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杨蕴清从北平辗转来到贵阳，与贵州地下党的李策见面后，分别在履三小学和高家花园给贵阳地区的一批学生党员和读书会骨干作报告，介绍“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号

召贵州学生组织起来。7月2日，在中华南路达德学校隔壁召开筹委会，选举朱世芬为“学联”主席，各校成立支部，陶信镛担任“学联”党团书记。几天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刚组建的“学联”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中，通过各校的学生自治会和一些公开的救亡团体，上街游行，下乡宣传。

1937年11月17日夜，“学联”秘密散发了《告同学书》，指出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危难关头，全体同学要行动起来，打破贵州学生运动死水一潭的局面。看了传单，很多同学感到鼓舞，国民党当局受到震动。为了对付“学联”的活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联合省政府教育厅，下令提前放假，组织各校寒假农村工作团。但在选举总团长、分团长和干事时，由于“学联”成员品学兼优，多数工作团的领导都由“学联”成员担任。“学联”成员团结各校进步师生，深入县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直到旧历除夕前才陆续返回贵阳。

（三）民先的建立及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的全国性救亡组织。1938年2月，张益珊离开延安陕北公学，受“民先”总队部派遣，随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来到贵阳，从事“民先”的组织和领导工作。3月份组成第一个分队，后建立地方队部，由张益珊任队长，凌毓俊任副队长，乐恭彦任组织部长、储兆龙、周兴仁分任康乐部正、副部长，凌毓俊兼宣传部长，谢琼英任妇女部长。人数迅速发展到了300余人，不仅有各个中学的学生，还有小学教师，书店店员、邮电职工。

“民先”成立后，除印发传单宣传抗日，宣传：“民先”的性质、任务，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小型图书馆，传阅进步书刊外，

还曾邀请刘方岳、傅君涛、邵公文等知名人士演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开展“打游击”、“抓俘虏”、演讲比赛、歌咏比赛、球类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贵阳“民先”地方队部还派人到一些县、区发展组织。经过民先队员和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分子的努力，“民先”组织象火种一样，散播到湄潭、沿河、安顺、郎岱、盘县、镇远、铜仁等地，点燃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

（四）音乐戏剧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贵阳地区党所领导的“筑光”、“沙驼”、“合群”这三个抗日救亡团体，是经过国民党省党部同意登记的群众组织。

筑光音乐会原是一些音乐爱好者以四川军阀杨森的名义，利用四川会馆进行活动的娱乐团体，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文艺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中共贵州省工委发动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进去，并动员音乐老师常学墉（现名任虹）担任艺术指导。

沙驼业余话剧社是由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肖之亮和共产党员杨天源在1936年创建的，以毅成、女师、男师、贵中等校部分爱好话剧的师生为主体。1938年3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于蕴等加入“沙驼”活动，使“沙驼”在面向社会、面向农村，以话剧唤起民众等方面迈出一大步。

合群体育会艺术部也是杨森创建的娱乐团体，杨森离开贵阳后很少活动。中共贵阳县委于1939年秋指派“沙驼”、“筑光”的部分党员和戏剧音乐骨干进入“合群”，使这个话剧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活动起来。

这三个救亡团体，积极贯彻党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筑

光”支部建立于1939年2月，先后由聂奇慧、黄奇轰、尹克恂担任支部书记；“骆驼”支部建立于1938年秋，先后由于蕴、黄奇轰、李登瀛担任支部书记；合群支部建立于1939年秋，支部书记胡铁骑（后叛变）。在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干事会开展活动。当时贵阳人口不到20万，大中学生不过几千人，仅“筑光”即拥有会员400多，足见其影响之大。

这三个救亡团体，互相支援，配合战斗，把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全国军民欢欣雀跃，“筑光”、“骆驼”联合组织义演和火炬游行。不久，这一战役负伤的战士运到贵阳南郊图云关陆军医院养伤，“筑光”、“骆驼”又组织人员到医院慰问，为伤病员写家信，演话报剧，唱救亡歌曲。1938年秋，武汉危急，“筑光”、“骆驼”联合组织了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民教馆广场打着火把教唱抗日歌曲，挽臂游行，显示了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决心。1938年12月，“筑光”联合贵阳音乐界的黄钟合唱团、贵阳青年会合唱团及路过贵阳的励志社和杭州艺专的音乐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劳军联合演出，《中央日报》为此出版了《筑光劳军演奏特刊》。

这三个救亡团体，在宣传上密切结合抗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很有针对性，如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再宣扬“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他们就大唱特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八一三”淞沪抗战，谢晋元因孤军镇守四行仓库，谱写了一曲坚持抗战的凯歌，他们就演唱《歌八百壮士》，高声喊出“中国不会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区军民成为抗击日寇的中坚，他们就组织演唱反映解放区战场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以鼓舞群众坚持抗战的意志。

这三个救亡团体，不仅在城市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县郊，邻近贵阳的定番（今惠水）、清镇、龙里、息烽、卫上、修文、乌当、北衙、花溪、青岩等县、区、乡、镇，都有宣传队伍的足迹，到处传播着抗日救亡的声音。

在“筑光”、“骆驼”的带动下，各大中学校的歌咏队、话剧队普遍建立起来。各地区如遵义的青抗会、音教会，贵定的白刃剧社、湄潭的飞鹰步行团，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

（五）知识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全面抗战开始后，外地一些大专院校、机关、团体陆续迁来贵州，一些在省外工作的贵州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也先后返回家乡，加上在贵阳坚持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山城聚集了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开设讲座，编辑副刊，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使贵阳地区的文化事业一度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

1937年8月，贵阳文艺界29人发起组织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在《征求会员启事》中鲜明地提出：“不甘灭亡，就得发动全民族全国民的抗敌斗争。”9月，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推选曾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进步教师刘方岳担任主席，进步教师蒋蔼如在会上阐述了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道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陈惕庐闭口不谈发动群众抗战，却大谈“一个党、一个主义”，“要以三民主义文艺救中国”。当即受到与会者的驳斥。在这样尖锐的斗争下，成立大会后未能开展具体活动。

1940年2月，由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蹇先艾等作家、教授发起，成立了贵阳文协。该会负责编辑《中央日报》（贵阳

版)的副刊《前路》和《贵州日报》的副刊《革命军》，还自办《抗建》月刊。

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出版的《十日》旬刊，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贵阳的国民党当局并未改变其反共政策，公然逮捕黄大陆、李策等一批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出刊的，所以刊物中强调了在抗日战争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破裂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

抗战文学的园地还有《贵州晨报》的副刊《每周文艺》，《大刚报》的文艺副刊《阵地》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抗战前线动态和后方社会面貌的文学作品。当时，重庆、桂林、昆明、成都和香港出版的大量书刊也源源进入贵阳，由进步作家主编的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尤为贵阳读者所欢迎。

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是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组织，成立于1938年5月，由中共党员王启霖、武纤生、蒋蒿如组成党小组领导这项工作。第一次座谈会在生活书店楼上，由生活书店经理邵公文召集，以后轮流在泰和庄梁园东教授家、阳明路贵阳医学院和白沙井王启霖家举行。参加活动的有四五十人，多数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及知名教师。座谈重点是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如全民抗战问题，抗战与民主问题、战时教育问题、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关系问题等。抗战中的重大事件，如武汉撤退后的形势、汪精卫叛国后的局势，各地发生的摩擦等，也都根据报刊资料加以剖析。还曾经座谈社会科学理论问题，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座的活动，有助于中上层知识分子交换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方针政策

的理解。

全面抗战刚开始，中国政府就与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最大支持，全国各地热烈庆祝，并相继组成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大会是1938年12月4日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礼堂举行的，国民党党政军当局及各机关团体代表500余人参加，高唱两国国歌及《抗敌歌》、《保卫中华》等爱国歌曲。文化界进步人士郭一岑、于治常、高滔、谢六逸等被推为理事。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后，王启霖承担了协会的日常工作，通过合法渠道，将苏联外文出版社翻译的大量书籍、版画运到贵阳，在群众中广为传播，苏联电影也经常放映，介绍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

由蒋蔼如、吴同尘等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通过传播容易学、容易读、容易写的新文字，向为数众多的不识字的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吴同尘领导的世界语学习小组和他参与活动的平民通讯社，从不同侧面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努力反映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

在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中，党所领导的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贵阳的分支机构读新书店，《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书店和分销处职员冒着被查封和逮捕的风险，在多次查抄后仍坚持活动，使全国各地的进步书报刊物得以广泛流传，闭塞的贵州得以同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汇成巨流，进步思想得以在贵阳地区迅速传播。

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贵州各族人民大力支持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中，贵州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不仅积极宣传，弘扬民气，激励士气，还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数十万黔中儿女参军参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数十万黔中儿女服务于战勤工作，修筑公路、机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各族各界人民捐款、捐物，写慰问信，鼓励前方将士，赈济灾民难民，安定后方秩序，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神圣的抗日战争。

（一）参军参战 英勇杀敌

抗日军队中，以黔中子弟为主组成的队伍计 11 个师，约 10 万余人。

贵州籍的抗日将士，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如一〇二师在徐州战役中，坚守碭山、苇楼，与日寇优势装备拼杀，寸步不让。全师伤亡 3000 余人，其中团长陈蕴瑜、营长曹文杰以下营连排长伤亡 130 余人。又如参加缅甸远征军的八十二师，曾坚守怒江，使日寇偷渡、进攻云南的企图未能得逞；在松山战役中，抗击日本侵略军，打通了由缅甸仰光到昆明的国际交通线，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其余参战各师，也都发挥了黔中子弟艰苦奋斗的精神，伤亡都很惨重。

为了支持抗战，不断补充兵员。贵州全省仅 1938 年至 1942 年 5 年间，实征兵额就多达 45 万余人，当时贵州全省仅 1050 万人口，可见参军人数比例之高。

贵州土地贫瘠，是有名的穷省。历来是征兵困难的地区，但在抗战期间，情况有所缓解，许多地方出现了“从军运动积极展开”、“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投笔从戎”的动人场面，如凤冈县长陈势涛带头参军，组成 2500 人的志愿兵团，开赴岳

阳前线，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保卫战。黄平县苗陇乡乡长带领120名苗胞报名参军，参与了保卫衡阳的战役。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还有很多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直接投入抗日战争。

（二）劈山开路 服务战勤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抗战前的贵州，道路崎岖，交通梗阻。抗战军兴，为适应战争需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前方抗战，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的交通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除搞好四大干线的维修养护外，新修公路2000多公里，超过战前贵州公路里程之和，各县还修筑了大量县道和乡道，方便了物资的运输。

作为战时大后方，为了支援抗战，贵州还修筑了包括飞机场、防空洞、战备仓库在内的大量军事设施。飞机场的建设包括扩建平远哨机场，修筑清镇机场、独山机场、旧州机杨、遵义机场以及岑巩、天柱、盘县等小飞机场。

服务战勤的民工，在“前方多流血，后方多流汗”的口号鼓舞下，在工资微薄或根本无工资可领（自带伙食）的情况下，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不畏艰难险阻，不怕严寒酷暑，努力完成战勤服务，为抗日战争作出牺牲。据统计，抗战期间贵州征用民工达3000多万个工作日，受伤者逾20000，死亡者逾2000。

（三）捐款捐物 支援前方

八年抗战期间，支援前方将士，支援全国难胞的募捐活动，在贵州一直很活跃。

抗战之初成立的贵州全省抗敌后援会设有募捐部，在他们的统筹下，各抗日救亡团体举办文艺义演，义卖书画，向富商巨贾劝募。如1938年秋冬间，发起的募寒衣活动，到11月

上旬,虽然只募到捐款 10 多万元,却形成一个影响全省的支前宣传活动。

1939 年,以基督教青年会“伤兵之友”社名义发起的“九一八”慰问伤员的活动,虽然只能给伤员少量的慰问品,慰问过程中,也只能给伤员作一些补衣、洗衣、代写书信、剪指甲之类的事,但由于筑光音乐会、大夏歌咏队等进步组织的参加,慰问活动成为激动人心的宣传活动。

1940 年 4 月,贵州各县上千所小学学生响应四川重庆市江北、巴县两地小学生发起的“中国儿童号”飞机捐款运动。由于爱国教职员和家长的支持,短短时间内便捐款 11700 多元,全数购置滑翔机,命名为“贵州儿童号”。

1941 年 3 月,位于安顺的黔江中学向全国各中学发起“中国中学生号”献机运动,拟订了《一日一分钱运动推行办法》,发出《敬告全国同学书》,他们在告同学书上写道:“亲爱的同学们,神圣光荣的抗战,在全国同胞的艰苦奋斗下,整整支持了四十个月。在这危难的苦战中,我们整千整万的同胞为国牺牲了,他们誓死抵抗敌人的残暴,……在前线的炮火下,在后方的轰炸中,用血肉给中华民族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了光明的坦途。……我们中学生是民族的前导,是民族的主人,要为建设空军而实践。”;黔江中学的这一倡议,虽然是在国民党建立“新空军”的影响下发起的,它必然受到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制约,错误地认为“万事莫如航空急”未能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消极抗日为发动人民全面抗战,才能使正面战场的情况根本改观。但从上述引用的字里行间看来,却洋溢着感人的爱国热情,展示了一颗颗赤子之心。